



张养浩与元代北方学统的建构*

刘成群

摘要:元代中期,赵孟頫在大都显示出了相当大的文化影响力。然而作为同时代的文章大家,张养浩却对赵孟頫表现出了明显的疏离姿态。张养浩的这种疏离大抵源于他对姚燧的崇尚。张养浩十分强调姚燧文章的“古文”意义,其意图乃是为了接续古文运动,以证明北方学统的合理性,并为自己接续北方学统寻找依据。在赵孟頫等南方儒士在大都的文化影响力与日俱增时,一些北方儒士明显表现出了文化上的紧张感。张养浩对北方学统的建构与维护就是这种文化紧张感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张养浩;赵孟頫;姚燧;学统;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0)02-0116-06

一、张养浩对赵孟頫的疏离与对姚燧的崇尚

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在杭州为官10年的赵孟頫被召回京师。此次回京,他不但获得中书重臣李孟的赏识,同时又赢得袁桷与邓文原这两位南方儒士的呼应,从而被推至文坛之潮头,正所谓“赵子昂以宋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邓善之、袁伯长辈从而和之,而诗学又为之一变”^{[1]593}。当时的一些著名的南方儒士如虞集、欧阳玄、柯九思、揭傒斯等人皆奉赵孟頫为圭臬,而北方的一些汉人儒士如宋本、许有壬、王守诚、李洞、李讷、吴炳等也都对赵孟頫推崇有加,甚至如泰不华、赵世延、康里巎巎等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也对赵孟頫十分推崇。可以说,赵孟頫在当时成为南北儒士共同取法的对象,一时无人出其右。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赵孟頫同时代的文章大家张养浩,在其文集中却找不到关于赵孟頫的任何信息,同时在赵孟頫的文集中也难以发现

有关张养浩的记载。至大四年(1311年),元仁宗即位,因爱惜张养浩的才学,将其召为中书省右司都事,随后任命其为翰林待制。是年五月,赵孟頫升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皇庆二年(1313年),张养浩为翰林直学士,而赵孟頫改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延祐二年(1315年),元廷行科举,张养浩以礼部侍郎知贡举,而赵孟頫为读卷官。张养浩自延祐二年至延祐六年(1319年)均在礼部,其间由礼部侍郎升为礼部尚书。延祐三年(1316年)赵孟頫进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一直到延祐六年辞京回乡。从这一系列的履历来,两人起码在至大四年到延祐六年应该有不少交集,皇庆二年甚至还曾一度在同一机构共事。然而,作为当时两大文章国手,在两人的文集中均找不到彼此的信息,的确不可思议。

现存文集中没有记载,确乎不能说明两人从无交集,如果强行认定,似乎有些“默证”之嫌。然而,这种状况却也能证明一个情况,那便是张养浩并不特别认同赵孟頫文坛宗盟之地位,否则他不会对赵孟頫表现出如此明显的疏离姿态。在张养

收稿日期:2019-09-15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元初大都‘文统’儒士集团研究”(16LSC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成群,男,历史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876),主要从事元代文化研究。

浩的心目中,所谓的文坛宗盟其实另有其人,此人便是前辈文章大家姚燧。张养浩第一次见到姚燧的时间大概是在至元三十年(1293年),当时张养浩只有24岁,正如其记载:“走年二十四见公于京师,时公直学士院。”^{[2]110}到后来,他正式进入姚门并得到姚燧亲炙,在《送李溉之序》中,张养浩写道:“曩余谢太子文学,数往来今翰长牧庵姚公门,时李君溉之从牧庵学。”^{[2]113}姚燧对张养浩也十分赏识,称其曰“年少而志厉,续学而善文”^{[3]404}。

张养浩在《送姚学士》中称赞姚燧云:“游目当今士,独公文柄操。”^{[2]42}姚燧去世后,张养浩有文祭之,在祭文中,张养浩谓姚燧“斯文之宗伯,旷百祀而一人”^{[2]201}。在《牧庵姚文公文集序》一文中,张养浩赞颂姚燧云:

皇元宅天下百许年,倡明古文,财牧庵姚公一人而已。盖常人之文多剽陈袭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驱气驾,纵横捭阖,纪律惟意……章成则雄刚古邃,读者或不能句。尤能约要于繁,出奇于腐,江海驶而蛟龙拏,风霆薄而元气溢,森乎其芒寒,皓乎其辉烨。一时名胜,靡不鰓鰓焉自阉所有,伏避其锋。^{[2]110}

在张养浩的眼中,姚燧系一代文章巨匠,当世文坛之主盟者,其地位固是巍然而不可撼。然而姚燧生前“颇恃才,轻视赵孟頫、元明善辈”^{[4]4060},既然姚燧对赵孟頫有如此成见,则纵使赵孟頫有再高的成就,恐怕一时也难入张养浩之眼。

二、姚燧对北方学统的建构

赵孟頫系南方儒士,而元明善早年仕宦于吴中,并在江南成名。姚燧轻视赵孟頫、元明善辈,不排除文人相轻的原因,但不同的南北学统应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自靖康以后,天限南北,南宋与金国形成了明显不同的文化形态,这种分化的态势直到元统一后仍表现得相当明显,家铉翁作为南人,就对当时南北文化隔阂状况有过描述:“迨夫宇县中分、南北异壤,而论道统之所自来,必曰宗于某;言文脉之所从出,必曰派于某。”^{[5]509}从这个意义上说,姚燧轻视赵孟頫、元明善辈,应该也有维护北方学统的原因。

姚燧出生在理学家庭,3岁时生父死,遂由伯父姚枢收养。姚燧在18岁时正式拜许衡为师,一

生以“从鲁斋先生最故且久”^{[3]67}而自豪。姚枢与许衡之学出自赵复,属于南方北上的朱子学形态。但到了姚枢与许衡这一代,则明显加入了金源儒学的特点,譬如许衡对卜筮、历算、医药的青睐,对“治生”的崇尚,就与南方理学传统意义中的淳儒有所不同。然而,许衡去赵复未远,对于南方理学的一些原则性的内容还是极为尊崇的,如许衡就十分维护理学家们“作文害道”的观念,他一直极力倡导“文章之为害,害于道”^{[6]72}之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强调“能文之士必蔽”^{[6]75},甚至不无偏激地说:“文士与优孟何异?”^{[6]72}许衡也曾教育姚燧说:

弓矢为物,以待盗也。使盗得之,亦将待人。文章固发闻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将何以应人之见役者哉?非其人而与之,与非其人而拒之,钧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3]68}

姚燧虽然出身于理学,但却对乃师“文章之为害,害于道”的观念不予认同,他认为:“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3]69}就是说,文章因为道而轻重,同时道也因为文章而轻重,如此一来,就把“文章”与“道”放在一个完全平等的位置上,查洪德就此评论说:“‘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不承认文对道的从属或依附,文章不一定要传道,特别是程朱之道。这在当时,是很有理论气魄的。”^[7]

到了姚燧这一代,北方的学术传承已经与当年的赵复之学颇有不同了。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变化,乃与姚燧对金源儒学的吸收有关。姚燧是杨奂的女婿,曾“婿其家,得观《还山集》者于夫人所”^{[3]49}。杨奂系当时研究韩文的专家,元好问就记载其撰有关于“删集韩文”的专著,并谓是书曰:“划刮尘烂,创为裁制,以蹈袭剽窃为耻。”^{[8]1452}此书即为《韩子》十卷。《元史·姚燧传》记载:“二十四,始读韩退之文,试习为之,人谓有作者风。”^{[4]4057}姚燧自24岁始读韩文并试习为之,这肯定受到杨奂的影响。

杨奂是从金末文风革新与儒学价值重估思潮中成长起来的人物,他与金末主导文坛的名公巨卿都有交往,如元好问记载曰:“礼部闲闲赵公、平章政事萧国侯公、内翰冯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与相问遗。御史刘公光辅、编修张公子中诸人,与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8]1456}四库馆臣谓杨奂有“中原文献之遗”^{[9]1430},良有以也。金亡之后,杨奂

与元好问交游最多。元好问赠给杨奂的诗称:“古来知己难,万里犹比邻。”^{[10]182}而杨奂思念元好问云:“短诗聊遣兴,羞向故人传。”^{[11]249}两人深厚友谊可见一斑。金亡后,元好问成为代表金源文化的一代宗工。姚燧对岳父的这位挚友频频提及,在姚燧《注诗音鼓吹序》称:“国初遗山元先生为中州文物冠冕,慨然当精选之笔。”^①姚燧又有《三老图三首》,其二曰:“从卧封龙十顷云,閤中肆外溢为文。若非用事多排比,党蔡诸公不足群。”^{[3]539}此诗题中有“三老”,首句有“封龙”,当指“封龙山三老”。《元史·张德辉传》载有张德辉与“元裕、李冶游封龙山,时人号为龙山三老云”^{[4]3826},元裕当为元好问。《三老图三首》其二则赞美元好问无疑,评价之高溢于言表。

姚燧虽然“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4]4059},但更为明显的是,他经由杨奂、元好问上溯金源,尤其是将金源儒学中“文”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李昉鲁翀赞云:“圣朝牧庵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奋而宗之。”^{[12]480}吴善赞云:“我朝国初,最号多贤、而文章众称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3]655}又柳贯则赞云:“故大德、至大、皇庆之间,三宗继照,天下义宁,而公之文章,蔚为宗匠。”^{[5]699}

姚燧为元初文章大家,其“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的观念代表着北方学统的价值追求。姚燧身上的理学素养虽然来自南方,但到了他这一代,已与南方理学学统明显不同,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离道倾向”^{[13]29}。当南方儒士赵孟頫或带有南方学养的元明善也以文章见称时,南北学统的差异就作为大背景显现了出来。姚燧在世的时候,赵孟頫在北方的影响远不及后来,虽则如此,姚燧还是显示出一些似嫌狭隘的举措,其中维护北方学统的优先地位或许要大于文人之间的意气之争。

三、元代南北文化的博弈

忽必烈平宋后,元廷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但在国家制度层面,元代的北方与南方长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在南北差异这一问题上,李治安曾给予了一系列的关注,尤其是《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一文专门探讨元朝统一后国家制度层面“南、北因素的并存博弈”^[14]的状

况,给人以极大的启发。与国家制度层面相似,元代的文化也存在南北隔膜并相互博弈的现象,这种隔膜与博弈对元代整个文化格局都起到了相当大的形塑作用。

元代文化之南北隔膜可以追溯到靖康以后的南北对峙时期,大抵因为天限南北的政局,从而导致南北文化交流的断绝。很多南人在南宋亡后方才看到北人的著述,正如俞德邻所言:“疆土既同,乃得见遗山元氏之作。”^{[15]77}正是因为对北方了解有限,南方儒士普遍以“斯文在兹”而自居,他们甚至认为:“江南士人曩尝谓淮以北便不识字,间有一诗一文自中州来者,又多为之雌黄,盖南北分裂,耳目偏狭故也。”^{[16]204}当然,北方儒士也在竭力维护着自己的学统,并把上溯金源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在政治层面,他们也以金源为正统,如郝经主张:“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17]446}如王恽认为:“据亡金泰和初,德运已定,腊名服色因之一新。今国家奄有区夏六十余载,而德运之事未尝议及,其于大一统之道似为阙然。”^{[18]3489-3490}显然都是以元朝接续金源。在合法性的建构层面,政统与学统是相得益彰的。

姚燧出身于理学,但他在《国统离合表序》中对朱熹包含有政统意识与学统意识的《资治通鉴纲目》颇有指摘,饶宗颐就曾指出:“元儒对朱子《纲目》有意见者,如姚燧之《国统离合表》,其著者也。”^{[19]52}姚燧乃杨奂之婿,杨奂晚年曾作《正统书》,有很多意见与朱熹之论相左,而符合北方儒者的价值取向,姚燧指责朱熹之失,当与杨奂的认识一致。

由于所尊崇的政统、学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起码在元初,南北儒士存在着明显的隔膜。南方儒士虽然偏激地认为北方“不识字”“雌黄”,但由于北方儒士在政治上占尽先机,前者较之后者明显处于下风。像赵孟頫甫入大都时就曾遭到耶律楚材之孙耶律希逸的质疑,议“至元钞法”时又遭到一位杨姓刑部郎中的指责:“昔金人定法,亦与大儒共议,岂遽无如公者!”^{[20]518}不过赵孟頫得到了忽必烈的垂青,还是留在了元廷。但并不是所有南方儒士都这样的幸运,与赵孟頫一同北上的大儒吴澄就不得不铩羽而归,临行前向赵孟頫抱怨说:“吾之学无用也,迂而不可行也。”^{[20]132}

不止是吴澄,发生在吴澄弟子虞集身上的一

件事也十分耐人寻味。《元史·元明善传》载：

（元明善）初在江西、金陵，每与虞集剧论，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诸经，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汉以来先儒所尝尽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为文辞，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然后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欢，至京师，乃复不能相下。董士选之自中台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门外，士选曰：“伯生以教导为职，当早还，复初宜更送我。”集还，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选下马入邸舍中，为席，出囊中肴，酌酒同饮，乃举酒属明善曰：“士选以功臣子，出入台省，无补国家，惟求得佳士数人，为朝廷用之，如复初与伯生，他日必皆光显，然恐不免为人构间。复初中原人也，仕必当道；伯生南人，将为复初摧折。今为我饮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酌之。起立，言曰：“诚如公言，无论他日，今隙已开矣。请公再赐一卮，明善终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饮而别。^{[4]4173}

或许在姚燧看来，元明善在南方成名，沾染了很多南方因素，不过就其一贯的表现来看，元明善还是一个标准的北方儒士，譬如他对南方儒士以朱熹之说为宗的取向就颇不认同。虽然朱熹之经说颇有集大成的气象，但也不是全能全善，元明善对虞集的批评可以代表当时很多北方儒士的看法。当然，虞集批评元明善文辞非性情之正，恰恰指向其文气纵横的一面，这也正是北方儒士承袭金源“文”所要追求的效果。

在元初乃至很长一个历史阶段，北方儒士都是稳稳占据上风的，在这种优胜的感觉中，北方儒士有时候也会表现出高风亮节来，他们也会借助仕宦南方的机会，表达对南方文化的某种欣赏，甚至还会模拟南方的某些风格创作，但这些必须建立在没有文化紧张感的前提之上。当北方儒士的地位不再那么稳固，优胜的感觉不再那么明显，则文化上的焦虑就会与之俱来，建立自己学统的合法性便要提上日程了。

北方儒士的文化紧张感大抵在赵孟頫第二次立足大都时浮现出来。至大三年，赵孟頫第二次立足大都，而此时有重要影响的北方儒士如夹谷之奇（？—1289）、胡祇遹（1227—1295）、雷膺（1225—1297）、徐琰（1220—1301）、王恽（1227—1304）、张

孔孙（1233—1307）、王构（1245—1310）等都已经去世了；而李谦（1234—1312）、阎复（1236—1312）、郝天挺（1247—1313）、姚燧（1238—1313）也在赵孟頫第二次立足大都后不久去世。这种客观原因也就造就了赵孟頫在文坛一时独大。当然，赵孟頫在大都文坛发挥出的文化影响力也有赖于袁桷、邓文原等人的支持与鼓吹，在赵、袁、邓等人的合力作用下，越来越多的东南俊秀汇集于大都，如欧阳玄记载：

东南士聚辇下，如四明公桷、巴西公文原、雍郡公集，有盛名公卿间。既而贡集贤奎章、周待制应极荐之，皆驰骋清途。公（揭傒斯）与清江范梈德机、浦城杨载仲宏继至，翰墨往复，更为倡酬。^{[21]140}

赵孟頫、袁桷、邓文原在大都产生文化能量的时代，也是某些北方儒士明显感觉巨大压力的时代。赵孟頫、袁桷、邓文原得到元统治者的宠信，政治地位并不输于北方儒士，北方儒士在政治上的优胜感早已不似往昔，学统上的比拼又向来半斤八两。也就是说，到了元代中期，对于南方儒士来说北方儒士已经不再具备明显优势。当然，并不是所有北方儒士都具有欲与南方儒士一争长短的心态，但不可否认，像张养浩这样的以接续姚燧而自居的北方儒士，重新建构北方学统则被他们视为一个重要课题。

四、张养浩对北方学统的建构

在金代的学术语境里并无太多对理学的推崇，而对古文运动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陈广宏就曾指出，金末时代赵秉文、杨云翼等儒士所主导的“古学复兴风潮”确实“推许其对唐宋古文传统的接续”^[22]。金亡后，元好问申明“唐宋文派乃得正传”^{[8]256-257}之义，以金源文化集大成者自居，展现出古文运动的某种遗风。姚燧对“文”的偏好经由杨奂、元好问等人可以追溯到金末儒学价值重估思潮。这一思潮崇尚宏观的“文”，其外表是辞章，其内核包含有丰富的“治道”内容，即这种宏观的“文”乃是“治道”与“文辞”的综合体，“在价值诉求与表现形式等层面更接近于唐宋两代古文运动”^[23]。与赵秉文等人相似，姚燧特别推崇具有“文以载道”观念的欧阳修，以之为楷模，如其云：“世复有班孟坚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欧阳子”。^{[3]69}

对于姚燧的这一特点,张养浩看得十分真切,他并不仅仅称颂姚燧“独公文柄操”或“斯文之宗伯”,同时还尤其强调姚燧接续唐宋古文运动的价值与意义。在张养浩那里,常将姚燧与唐宋文章大家并列,如“豪放抗衡于坡老,正大并轡乎昌黎”^{[2]201},或将姚燧比作韩愈、欧阳修,如其云:“公与二子代虽不同,要皆间气所钟,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2]110}在张养浩笔下,姚燧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古文运动的意义,在元明善的神道碑铭中,张养浩写道:

夫古文自唐韩、柳后,继者无闻焉。至宋欧阳公出,始起其衰而振之,曾、苏诸公相与左右,然距韩、柳犹有间。金源氏以来,则荡然无复古意矣。天开皇元,由无科举,士多专心古文,而牧庵姚公倡之,駸駸乎与韩、柳抗衡矣。^{[2]172}

接续唐宋古文运动乃是金末以来北方儒士的使命感之所在,姚燧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而张养浩着力强调姚燧的“古文”面相,其目的无疑是以历史依据来建构北方学统的合理性。在建构北方学统的过程中,姚燧虽然是张养浩心目中的标志性人物,但如刘因、王恽极富“文”之追求的北方儒士,张养浩也一并予以礼赞。如在刘因、王恽谢世后,张养浩分别有诗挽曰:

白发山林仅四旬,两朝不肯屈经纶。
才名暗折世间寿,气节伟高天下人。康节纵吟无限乐,希夷高卧有余春。一生怀抱谁能识,他日休猜作逸民。^{[2]54}

束发耽经晚益勤,平生精力尽斯文。
前朝十老今余几,当代三王独数君。李贺屡烦韩愈驾,羊昙空阻谢安坟。玉堂寥索人何在,落日溪窗满白云。^{[2]84}

邓绍基曾指出:“刘因的论诗见解基本上继承了元好问的论诗主张。”^{[24]407}查洪德认为刘因诗文有“派继中州”^[25]的特点。所谓的“中州”,当然指的是通过元好问所汲取的北方文化传统。王恽乃是元好问弟子,常常以“文键亲承警欬余”^{[18]1453}自豪,或曰“分明昨夜梦遗山,指授文衡履絢间”^{[18]639},甚至以继承元好问而自居,如其云:“党赵正传公固在,阳秋当笔我奚任。”^{[18]756}对于刘因,张养浩并不仅以“逸民”视之,而强调其他人未识之怀抱;对于王恽,张养浩着力渲染其“尽斯文”的一面,显然都是从维护北方学统的角度出发的。

除了刘因、王恽,像许衡与李孟等并非特别长于“文”但在北方儒学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张养浩也十分看重,如评价许衡:“我朝鲁斋许文正公衡,其所陈于世祖皇帝前者,无非尧舜禹汤治天下大经大法,三代以降,皆无所及。”^{[2]126}评价李孟:“辩章秦国公早以儒术事皇上潜邸,从行中外且二十年,格论嘉猷,所以开广天聪、封植国本、阴毗治道、以斐以迪者,靡遗余力。”^{[2]123}可以看出,张养浩主要从“治道”层面审视许衡、李孟等人,即便是在理学史赫赫有名的许衡,张养浩也不特别阐明其理学意义。总之,在张养浩的笔下,无论是许衡还是李孟,体现的是北方政统与学统同构的特点。

除了姚燧之外,张养浩还特别推崇元明善。张养浩与元明善交游甚多,两人与曹元用并称“三俊”。在张养浩的文集中可以看到不少酬赠元明善的诗文,如谓其“文辞蹕厉奇刻,肖其为人”^{[2]115},显示出明显的推崇之意。元明善去世后,张养浩有挽诗云:“平生碑版天留在,不朽何须借景钟。”^{[2]65}张养浩对元好善的推崇,乃是以其接续姚燧,如其曰:“天开皇元,由无科举,士多专心古文,而牧庵姚公倡之,駸駸乎与韩、柳抗衡矣。其踵牧庵而奋者,惟君一人。”^{[2]172}不过从现有资料来看,元明善对姚燧并未有特别敬礼之意,倒是张养浩自己颇有接续姚燧的想法,张养浩在《祭姚牧庵先生文》中曾提问曰:“今公云亡,孰柄文兮。”^{[2]202}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整篇文章确乎暗含以道自任的主旨。在《牧庵姚文公文集序》中,张养浩接续姚燧之意图则体现得更为明了,如其云:

窃惟韩昌黎文,李汉氏序;欧阳公文,苏轼氏序。公与二子代虽不同,要皆间气所钟,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走何人,敢于焉置喙? 辞不获,因纪平昔所尝得诸心目者,姑副所恳。^{[2]110}

姚燧指授过的弟子很多,甚至还形成了一个具有流派性质“姚门文章家群”,“群体的核心成员张养浩、字术鲁翀、刘致、贯云石、李洞等人”,他们文章的“共同点是古雅刚方、春容盛大、动荡开合、气势宏壮、时见奇峻,是其峻洁人格的反映。他们也有平易畅达之作,则得之于作者浩然正大之气”^[26]。字术鲁翀是文章家群中影响力仅次于张养浩的人物,曾为张养浩的《归田类稿》作序,也是以张养浩接续姚燧,如其言:“圣朝牧庵姚文公以古文雄天

下,天下英才振奋而宗之,卓然有成,如云庄张公,其魁杰也。”^[12]⁴⁸⁰这恐怕也代表着时人的普遍看法。

张养浩突出姚燧文章的“古文”意义,乃是为了接续古文运动,以证明北方学统的合理性,并为自己接续北方学统寻找依据。元初,北方儒士由于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而表现出明显的学统优越感;但到了元代中期,赵孟頫等南方儒士在大都的文化影响力与日俱增时,一些北方儒士则明显表现出了文化上的紧张感,张养浩对北方学统的建构与维护就是这种文化紧张感的具体表现。

注释

①在四库馆臣所辑的《牧庵集》中有《唐诗鼓吹注序》一文。此文据陈开林考证,“乃拼接武乙昌序文前半部、姚燧序文后半部而成”。陈开林检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著录的元刊十卷本《注唐诗鼓吹》,得赵孟頫、武乙昌、姚燧三序。其中姚燧序即为《注诗音鼓吹序》,我们所引即为此篇序言中的部分文句。见陈开林:《四库本〈牧庵集〉所收〈唐诗鼓吹注序〉辨误》,《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4期,第50—54页。

参考文献

- [1] 顾嗣立.元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 张养浩.张养浩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 [3] 姚燧.姚燧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 [4] 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5] 苏天爵.元文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 [6] 许衡.许衡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
- [7] 查洪德.理、气、心与元代文论家的理论建构[J].文学评论,2010,(1):43-50.
- [8] 狄宝心.元好问文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9]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0] 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1] 杨奂.还山遗稿[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2] 李学鲁.菊潭集[M]//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 [13] 查洪德.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4] 李治安.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J].历史研究,2011(5):59-77.
- [15] 俞德邻.佩韦斋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6] 张之翰.张之翰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 [17] 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 [18] 杨亮,钟彦飞.王恽全集汇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9]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 [20] 赵孟頫.赵孟頫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 [21] 欧阳玄.欧阳玄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 [22] 陈广宏.“古文辞”沿革的文化形态考察:以明嘉靖前唐宋文传统的建构及解构为中心[J].文学遗产,2012(4):98-111.
- [23] 刘成群.金末儒学性质再辨析[J].安徽大学学报,2018(1):47-55.
- [24] 邓绍基.元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 [25] 查洪德.北方文化背景下的刘因[J].文学遗产,2002(3):71-82.
- [26] 查洪德.姚门文章家群的人格与文品[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5):137-150.

Zhang Yanghao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ern Academic Tradition in Yuan Dynasty

Liu Chengqun

Abstract: In the middle of Yuan Dynasty, Zhao Mengfu had great cultural influence in Dadu. However, as one of the master writers of the same period, Zhang Yanghao apparently showed alienation to Zhao Mengfu, which probably originated from his worship of Yao Sui. Zhang Yanghao extremely emphas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rose” in Yao Sui’s articles with the intention of continuing the ancient Chinese prose movement in order to 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northern academic tradition and find the basis of his insistence on the northern academic tradition represented by Yao Sui. When the cultural impact of the southern Confucian scholars, like Zhao Mengfu, increased with each passing day, some northern scholars were nervous about the cultural impact of the southern scholars. Zhang’s construction and insistence of the northern academic tradition concretely manifested such kind of cultural tension.

Key words: Zhang Yanghao; Zhao Mengfu; Yao Sui; academic tradition;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周 舟]